

教坛耕耘六十载 求是诚朴为一生

——缅怀我国电机工程学界一代宗师王国松先生

◆ 刘雁斌 周文 查仁柏



王国松（1952年10月）

王国松，字劲夫，1902年6月29日出生在浙江省永嘉永强（今温州瓯海），1983年12月3日在杭州逝世，享年82岁。

王国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电机工程学家和教育家，中国电机学科

的一代宗师，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的创始人之一，历任浙江大学电机系主任、工学院院长、副校长、代校长，一级教授。王国松先生曾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浙江省人大代表，并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、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、浙江省科联副主席、杭州市科联主席、民盟中央委员、电力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和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顾问等职务。

王国松先生从事教育工作近60年，为发展浙江大学，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，培养电机工程科学技术人才，呕心沥血，鞠躬尽瘁，贡献了毕生的精力，在国内外电机工程界享有很高的声望。

1 聪颖不忘努力，动力来自理想

王国松先生出生在浙江温州一个加工银首饰的手工匠家庭。他于1909年入私塾，1911年入温州私立大同小学，1913年入永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。1915年12月，王国松在全县小学毕业会考中名列榜首，但其父要他辍学在家学习银匠手艺以补家计。在其祖父的干预和极力支持下，王国松

才得以有继续读书的机会，并于1916年秋以第1名的骄人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（今温州第一中学）。为此县太爷还披红坐轿，伴随着锣鼓声特地上门报喜。王国松聪颖俊达，诚恳朴实，学习努力踏实，每学期的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，最后又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。当时同学们都以“老第一”称呼他。特别是他的数学基础扎实，心算敏捷，深受师友赞誉。

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爆发后，他在进步教师和校友的影响下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，参与罢课斗争和抵制日货等宣传活动，开始领悟到读书不忘救国的意义。1920年8月，怀抱“实业救国”、“科学救国”的理想，王国松先生以第1名的成绩考入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（浙江大学前身）电机工程科，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最早研究电机工程技术的大学生。1922年3月，王国松得了伤寒症，不得不休学回家自学。期间，他除了学习功课外，还自学了中医中药方面的知识。1923年2月，王国松复学。在校期间，王国松品学兼优，曾任校学生会主席。1925年3月，因得到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，政府决定派遣中国学生去日本参观，王国松也在其中。40天的参观中，王国松看了日本的学校和工业建设情况，得到不少启发。同时他也从展览馆中设有满洲馆而感觉到日本有侵略中国的野心。1925年夏，王国松先生以第1名的成绩毕业，并留校任助教，从此开始了他在浙大长达近60年的执教生涯。

王国松任教的最初几年，先后在附设高工和工学院预科教授数学、物理、电磁测定等课程，也曾经遇到一些校外老师、至亲的邀请，在盛情难却之下，勉强去做过一些别的工作，但他总不忍心离开浙大，也不愿违心地追求高官厚禄，因此在外任职的时间极为短暂。

1930年6月，王先生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浙江省公费留学考试，8月赴美国康乃尔大学研究院



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时期
(1932年5月)

深造。王先生仅以两年半的时间，先后获得了电机工程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。

在美国深造期间，他学习勤奋，成绩突出，深得老师的称道。有一次考试，7道题目，限1小时做完，王国松在限定时间内做完做对了全部题目，令美国教授大为惊奇，赞叹“中国人聪明，了不起”！他的博士论文《平行导线的集肤效应》具有独到见解，他运用矢量磁位概念进行研究和分析，解出了圆导线的集肤效应和平行导线的邻扰效应。经过他严密的数学推导和论证，解决了确定边界条件时曾遇到的困难。他所提出的解法，满足了更精确、简便地定量计算的需要。为此，他于1933年6月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论文的答辩，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。王先生还帮助解决了美国教授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，如某教授提出的“不振荡 R 、 L 、 C 串联电路放电电流最大率”的科研题目。导师将此题目交给了王国松，经他努力，该题就解决了。王先生突出的学习成绩和出色的研究才能给该校留有很好的印象，直至1980年以康乃尔大学校长为首的代表团访华时，代表团还想会见这位当年的学生。在美期间，王先生加入了中国工程师学会美国分会，并任副会长，后又加入美国电机工程师学会。

2 国难当头西迁保浙大，临危受命挺身护浙大

1933年8月，王先生学成归国，受聘为浙江大学电机系副教授，讲授电机、电路、电工数学、发配电等课程。1936年5月，我国著名气象地理



与夫人陈汉兰女士合影(1928年，杭州)

学家、教育家竺可桢先生接任浙江大学校长，王先生被任命为浙大工学院电机系主任，次年晋升为教授，肩负教学和行政领导的双重任务。

1937年7月7日，日寇侵袭卢沟桥，抗日战争爆发。8月，日军在进攻上海的同时，开始轰炸杭州。王先生受竺校长的委托，赴西天目、建德等地勘察浙大的搬迁地点。11月，在日机轰炸中坚持上课3个多月的浙江大学，不得不走上西迁流亡办学之路，初迁浙江建德，继迁江西吉安、泰和，再迁广西宜山，终迁贵州的遵义、湄潭和永兴。王先生与浙大师生同甘共患难，在极度恶劣的物质条件下，坚持教学和科学研究。在西迁途中，为了保证教学和实验的正常进行，他亲自参加图书及实验设备的装箱、搬运、拆卸和维修等工作。每到一地，行装甫卸，即使在隆隆炮声中他也坚持上课、实验和科学研究，从未间断。在这长征式的万里跋涉中，仪器设备能保持完整无缺，并如期开出实验课，这在当时的困境中是极其不易的。在遵义，王先生竭尽全力，亲自筹建了浙大工学院实验室，使工学院的学生既能受到扎实的理论教育，又有实际操作的技能训练。当时，教育经费十分匮乏，没有钱盖实验楼，只能因地制宜建立简陋的实验室。在王先生的亲自筹划下，在紧靠着遵义老城城墙外的湘江之滨建立起数百平方米的一群草顶、泥墙、土地坪的电机、化工、机械等实验室。远远望去这些实验室很像是一排排农民草舍，但里面却井井有条地安装着各种机床，一台台交、直流电机，仪器设备以及木制的实验桌和开关柜。这些实验设备和各种仪器仪表，基本上满足了当时教学实验的要求。那时遵义没有发电厂，晚间照明的是菜油灯和桐油灯，王先生又费尽心机，在实验室场地上建立了发电间，柴油昂贵使用菜油作燃料。就这样，发电供实验和照明之用。

1942年，王先生被任命为浙江大学工学院代理院长，1944年被任命为院长兼电机系主任。在这腥风血雨的岁月里，在祖国僻远而贫脊的大西南山区，艰难困苦可想而知，王先生竭尽全力，辅佐竺可桢校长，和工学院全体师生一道艰苦地生活、学习和斗争，勤奋执着地进行教学和科学

研究,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爱国的高水平科技人才。

在浙大西迁中,王先生的乐观豁达精神也深深地感染着身边的师生。有一次,王先生带领着学生考试,计算尺正拉得紧张的时候,空袭警报响了。此时此刻是坚持还是暂停?坚持,敌机来了怎么办?暂停,考试又怎么办?但王先生出于对学生安全的关切,果断地决定“解除了警报再回来, time out”,并催着大家去躲避。他相信同学们不会在躲避中“交头接耳”地作弊。也不知隔了多长时间,一声长调,解除警报终于响了。当大家赶回考场时,只见王先生早就回来了,他满意地看到一张张考卷没有被风吹掉,看到学生们一个不缺地就位又拉起了计算尺,愉快地笑了。



西迁时在广西宜山留影(前排左3为王国松)(1940年1月)

在西迁期间,王先生先后发表了《三刷发电机》、《平行导线的集肤作用》、《矩形导线的集肤作用》、《不振荡电路之极大放电率》、《直流电机之短路电流对于磁场之反应》、《复卷电动机之起动》及《阻抗算子乘积之运算》等数十篇学术论文。这些论文是我国电机学界初期的一批优秀而重要的论著,为我国电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抗战西迁的经历,不仅完好地保存了浙大,确立了由竺校长提出的“求是”校风,而且吸纳了众多爱国学者加盟浙大,大大壮大了教师队伍。1937年浙大离开杭州时,仅有3个学院16个学系。抗战胜利后返回杭州前夕,浙大已有6个学院、25个学系、4个研究所、5个学部、1个研究室、1个分校、2个先修班及1所附属中学,另外还有11所工场和300亩农场。这一时期成为了浙大发展的重要时期,使浙大得以跻身于国内重点大学行列,

并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影响。英国科学家、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博士于1944年曾两次参观访问了在贵州湄潭的浙大,并参加了学术交流。当他看到在土房子里研究出来的震动国内外的学术成果时,深为感慨,对浙大的学术空气之浓、学术水平之高给予了高度评价,赞誉浙大是“东方剑桥”。

抗战胜利后,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,王先生继任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任。他认真贯彻竺可桢校长的办学主张,通过各种渠道,罗致有声望的教授和国外归来的学者,实行“民主办院”,使教授们各安其位,爱校胜己,形成了学术核心。并且在工学院原有的电机、机械、化工、土木等老系的基础上,增设了航空工程系。而他作为工学院院长“上交不谄,下交不黷”,身正令行,以身作则,以道德和才学带动及影响着全院师生,使全院师生精诚团结,“求是”、“诚朴”蔚成风气。

无论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,祖国的生死存亡都牵动着王先生的心。在浙大西迁时期,王先生坚持正常教学、科研的同时,还带领大家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。王先生协助竺可桢校长于1940年初和1945年初两度组织“浙大战地服务团”奔赴抗日前线和部队驻地;1943年末至1944年初与1944年冬,又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“劳军运动”,以义演募集劳军费用,给开赴前线的过路部队赠送衣物、香烟、草鞋、毛巾等慰问品;组织进步社团“拓荒社”、“黑白文艺社”、“黎明合唱队”、“塔外面社”、“铁犁剧团”等,通过壁报、演出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。

1947~1948年,王先生热情地支持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运动,特别是在浙大发生而影响全国的“于子三”事件中站在进步学生一边,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学生。1948年,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,国民党统治开始总崩溃。国民党教育部在潜逃前夕,有意要浙大南迁或拆散后并入其他学校。浙大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了“决不迁校”的斗争。此期间,王先生不但赞成“决不迁校”,而且还劝留了不少教授。

1949年4月24日,浙大成立了由25人组成的“应变委员会”,并下设11个组。在此之前受竺校长之邀和苏步青、李天助一起参加了校安全委员

会的王先生，在浙大应变委员会中负责经济组和水电组工作。随后，竺校长拒绝了国民党政府要他去台湾或出国考察的要求。为避免国民党的纠缠，竺校长不得不隐居上海，迎接解放。在此关键时刻，浙大组织了临时校务委员会，蔡邦华任主席，王国松和谭天锡任副主席，3人共同主持校务工作。王先生和全校师生同心协力维护浙江大学的安全，为完好地保护浙大，迎接人民政府的接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王先生协助竺可桢校长办学13年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，故被竺校长将他誉为浙大的“中流砥柱”。

3 爱生如子为育才，宗师精神成丰碑

王国松先生治学严谨，学识渊博，学术造诣很深。他讲授课程条理清晰、引人入胜，并能因材施教。他采用启发诱导式的教育方法，不主张死记硬背。他还教导学生要注意劳逸结合，有张有弛。因而他的教学方法受到学生们的一致推崇和钦敬。他爱生如子，为贫困学生排忧解难安排工读，对毕业生，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，都一视同仁、千方百计地为他们找工作，真是难能可贵。他总勉励学生要实事求是，不务虚名，并以“人生应以服务为目的”等格言相赠。他重视基础理论教学，也重视实验教学，并很注意对学生的德育和体育培养，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、重视全面发展的教育家。在学生们眼中，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教师，也是一位长者和慈父。

王国松先生开设的课有《直流电机》、《交流电路》、《电厂设备》、《输电配电》等，尤其是《电工数学》，堪称国内首创。王先生自编讲义，应用数学来论证和解释各种电磁现象，效果很好。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说：“电工数学这一课不但弥补了学生在数学方面的不足，还教学生怎样把抽象的数学应用于具体的学科，使之有了数学模拟这个概念。回想起来，当初在理解电机里的分槽线圈怎么会发出正弦曲线的电压来，以前只能以图解来解决，学了电工数学就可以用数学来模拟。这在当初的学业上，真正是一个突破。恍然大悟啊，说已达到了‘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’的程度，也不为过。”

王先生在电机工程专业上知识广博精深，讲授时清晰透彻，学生在课堂上听其讲课有“如沐春风，而沁入心窍”之感。交流电机课本由美国

康乃尔大学教授所编著，王先生亦纠正了其中一些错误。王先生的心算能力非一般人所及，两位数乘两位数可以不假思索地写出结果，即便是两位数乘三位数或三位数乘三位数，至多也只停顿1秒钟便能得出正确结果。

王先生治学非常严谨。他从作业中、考卷中发现了错误或疏漏，便会有针对性地、不厌其烦地逐个指正并讲解清楚。他对计算的准确性非常重视，例如，若计算结果数字正确，而小数点向前或向后错点了1位，那么扣分就很厉害。王先生说：“若在工程设计中错1位小数点，按此数据制造产品必将报废，将给国家带来损失。”

在浙大西迁的岁月里，正是民族灾难深重、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，大多学生到内地求学要背井离乡，穿越火线，经济时常陷入困境，但又举目无亲，无所依靠。王先生总想方设法帮助他们，为他们排忧解难，因此和学生们建立了同患难、共生死的浓厚感情。从战区来的学生吃饭大多靠学校贷金，额度甚微，仅够吃糙饭，8人共吃一碗蔬菜，衣着费用都得靠自己设法解决。有的学生几年买不起一双袜子，有的衣衫单薄难以御寒，有的得了夜盲症晚间不能学习。王先生要花许多精力帮助学生克服困难。他千方百计争取扩大贷金额度和贷金面，尽力给学生安排一些刻蜡纸、打字、抄写等工作，让学生勤工俭学，以解燃眉之急。王先生还在校务会上竭力主张设立寒衣贷金，帮助学生度过难关。对于一些特别清寒的学生，他也常帮助垫付学费，使他们不致中途辍学。地处穷乡僻壤，缺医少药，王先生就以早年所习的中医秘术行医，给师生和家属号脉看病，辩证施治，开方抓药，并且亲自给学生送药。他



全家福（1954年10月）

开的药方虽然常常只是简单的几味药，但效果颇好，因而蜚声全校。大家对这位洋博士格外推崇，常说：“Doctor is now a doctor”（博士现在是医生）。虽属趣言，但从中可见同事、学生们对他的爱戴和敬重。为良师者亦为良医，王先生当之无愧。

王先生的高尚品质赢得了学生们的崇敬和爱戴。一位学生这样写道：“王老师不仅给我们传授科学知识，而且教我们为人之道，他的师德永存人间。他坚持真理，以‘求是’精神对待一切，在我们心中，他永远是一棵不怕风吹雨打挺立在山峰的劲松”。

1982年4月，在浙大建校85周年的全校庆祝大会上，王先生应邀作了简短的讲话。当他说到他一生从考进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起，除了中间去美国读书的几年外，在浙大的时间总共是62年时，全场长时间地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他和浙大的渊源是如此之久，想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。他先后辅佐竺可桢、马寅初等校长，为浙大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和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，堪称是一代宗师。我国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如是称道王先生：“乐育英才，业绩辉煌，人之麟凤，国之祚祥”。

由于王先生非常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，差不多每年都要带领学生到浙江省各地电厂去实习，并提出建设性建议。为感念王先生对电力事业的贡献，弘扬王先生高尚的道德品质与严谨的治学精神，在王先生仙逝后，由浙江大学与浙江省电力局发起，于1996年11月22日集资成立了“王国松教育基金会”，用于支持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建设和发展，激励“求是”学子刻苦钻研、勤奋学习、追求真理、报效国家。

4 创立电机学会，为祖国建设事业建言献策

王国松先生是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（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前身）的发起人之一。1934年7月，王国松先生和李熙谋、顾毓琇、章名涛、张廷金、杨耀德等教授联署发表了《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缘起》一文，倡议国内从事电机事业的同志组织一个学术性团体，希望在学术理论和技术方面进行研究，以作政府建设之后盾和电工企业之咨询。1934年10月14日，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在上海成立，王先生出席成立大会并被推选为学会会刊

《电工》杂志的编委。他为学会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，如发展新会员、推动电工学的研究、定期出版《电工》杂志等，他本人也在此平台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。

1950年6月，由马寅初校长提名，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，王国松先生被任命为浙江大学副校长。1951年5月~1952年11月，王先生代理浙江大学校长，倾尽全力主持全校领导工作。1952年，浙江大学调整为多科性工业大学，王先生出任第二副校长。1954年，王先生当选为浙江省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代表，并出席了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。王先生又担任浙江省政协委员、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、民盟中央委员及浙江省民盟副主委等职务。1955年，王先生晋升为一级教授。王先生为建设和发展新浙大，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。



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时与中央领导同志合影（第2排左2为王国松）（1954年9月21日）

1956年，作为我国电机工程学会的知名专家，王先生应国务院邀请到北京参加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全国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讨论和制订工作。期间，他为发展我国的电力工业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。现在我国电力电工界的很多同志都是王先生当年的学生，他们都很推崇王先生对发展中国电力电工事业的功绩。

5 世事烟云孰能料，磊落坦荡真君子

1957年，时任浙大副校长秉性正直的王国松先生，被卷进了那场“反右”的政治风暴，因某些直言意见而被划为右派。从此，如日中天、本可为

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大展雄才的王先生被撤销了浙大副校长职务，工资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，又被撤销了民盟中央委员和浙江省第三副主委的职务。王先生所幸的是，随后回到了他所熟悉的电机系电工基础教研组，教授他驾轻就熟的电工基础等课程。但一生追求真理的王先生却坚信：“一个人的是非功过，最后人民是会做出结论的，我们要坚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”。

1962年，王先生摘除了右派分子的帽子，并列席全国政协会议，再次见到毛泽东主席，聆听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，内心非常激动。回校后王先生继续执教，并积极培养年轻教师。同时，他还热心参与全国通用教材《电工基础》的编写工作和科研工作，1963年撰写了《分裂导线静电力和电磁力的作用》的论文，发表在《浙江电力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选集》上。

王先生是多么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，能在教学中实实在在地做些工作。然而，1966年，一场在全国刮得天昏地暗的“文革”风暴又席卷而来。在“怀疑一切，打倒一切”、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极左口号下，浙江大学70多位正副教授中的绝大多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。被称作反动学术权威祖师爷的年逾六旬的王国松先生更是首当其冲。老人弓着腰，低着头，挂着牌，接受无数次的“批斗”、“陪斗”，被关入“牛棚”，赶进“劳改队”，干着超负荷的笨重劳动。1967年下半年，王先生由于过度劳累而得了迁延性肝炎，还不得休息。王先生全家也由50多平方米的住房强行搬进十六七平方米的又破又小的板壁房。有的床铺白天无法架起来只能到晚上临时架设，否则就无法活动了。外面刮大风，里面刮小风，外面下大雨，里面下小雨。王先生从教几十年，没什么家什，唯有许多科技书籍和杂志是最心爱之物，但又无处存放，赠送给学校又遭拒绝，只好忍痛当废纸处理！在所谓的隔离审查期间，受饥挨饿也是常事。

直到1972年，王先生所谓的历史问题——参加国民党和中统特务组织，才总算弄清并做出了“查无此事，予以否定”的结论。“位卑而不忘忧国”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十分令人尊敬的。尽管他们有时会遭到无端的冲击，身心受折磨，生活遭窘迫，但是他们的报国之心始终不会泯灭。一旦有条件，允许他们把知识和才能为国服务时，他

们就会忘我地拼命工作。王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1973年浙大复课，年逾古稀的王先生被允准重返教研组任教，给工农兵学员上课。因为工农兵学员的基础较差，原来的教材已不适用，王先生则动手改编讲义。一段时间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，戴上老花镜在灯光下翻阅资料编写讲义，绘制插图。由于伏案时间过长，一条腿常常麻木，行动不便，但他仍坚持工作，亲自把讲义稿送到印刷厂付印、校对，直到把讲义发到学生手中。王先生精心培养青年人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。

1979年2月，王先生彻底平反，恢复了名誉和工资待遇。从1957年被划为“右派”一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，在这漫长的20多年中，王先生与其他许许多多的“右派分子”一样，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最宝贵的年华。这对他们自身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和挫折，对国家而言也莫不是一种巨大损失。但王先生那种坦荡磊落的君子之怀，拳拳报国的赤子之心却很令人感佩。他豁达乐观，长年如一日，坚信总归有一天会弄清其冤屈，所以依然执着于他的教育事业。当然，在那样的年代里，王先生心里也是无比苦楚和无奈的，但不是为个人的荣辱，而是苦于报国无门，才华无处施展。



会见北美校友合影（前排右2为王国松）（1979年）

1980年5月，冤案得到平反的王先生却患了结肠癌，动了大手术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王先生依然为祖国和浙大奉献着自己。他还在研究加强教研室工作、发挥教研室作用、打好教师和学生的基础、理论联系实际和因材施教等问题。只要有机会，他都会去了解国内外的科技发展情况，与校友讨论教学问题。正如他对子女们所说的：“我虽然年事已高，但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关怀。我要竭尽全力为国家多做点事”。



在资料室（1980年）

改革开放后，王先生亲自安排浙大代表团访问美国，多次亲自与北美校友会进行信函联络，访问日程和具体参观项目等事宜也都亲自安排，但终因身体原因而未能同往。但这次访问增进了国外校友与母校的联系和情谊，也推动了浙大与国外院校的科技合作和学术交流。1980~1982年，王先生仍然带着病弱之躯，频繁地参加各种活动，为发扬浙大优良校风和增进国内外校友与母校的联络而操劳、尽职。他出席了“竺可桢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”讨论会；在“马寅初先生百岁寿辰庆贺会”上作了题为《忆马校长二、三事》的讲话；参加了1982年浙大建校85周年大会，并发表了题为《愿校友保持母校的优良作风》的演讲。在演讲中他说：“值得一提的是，母校的校风‘求是’精神与‘诚朴’作风，一直得到了发扬。我们校友都经受过这种校风的熏陶，在学习上和工作中都将它作为准绳，因而大家都能勤奋学习，实事求是，埋头苦干，努力向上，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并得到了社会上一致的称赞。许多校友都已成为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骨干力量。这是很值得庆贺的。”从这些淳朴的话语中，人们可以领略到王先生的品格、精神和风貌是何等的高尚。直到王先生临终前10天，他还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我要赶快回去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”。他用颤抖的手亲自填写了民盟中央寄来的委员登记表。

1983年12月，王国松先生在杭州病逝。遵照王先生的遗愿，其部分骨灰撒在了浙江大学“求是”花坛之西的桃李园内，永驻浙大，完美地实现了王先生的话：“我这一生和浙大结下了不解之缘”。数学家苏步青教授写诗怀念老友王国松先生：“忆昔同窗瓯海边，惟君风度最翩翩；正

期世改宜挥腕，未虑身危独敢言。风雨猖狂悲往事，江山稳转着新鞭；若为去岁长离别，悼念遗容一泫然。”

6 先生驾鹤去，丰功伟绩留人间

王国松先生在浙江大学60多年，其中担任电机系主任15年，工学院院长9年，堪称“浙大的中流砥柱”，是我国杰出的电机工程学家和教育家。

王国松先生的一生，是对祖国、对党、对教育事业无限忠诚的一生；是对事业、对科学不断探索精益求精的一生；是求是诚朴、光明磊落，追求真理、坚持真理的一生。我们要学习他实事求是、勤奋好学、博学上进、艰苦奋斗的精神；学习他治学严谨、任劳任怨、爱生如子、诲人不倦，为培养科技人才兢兢业业、无私奉献的精神；学习他严于律己、宽以待人，淡泊人生，为人正直，一身正气，即使身处逆境也豁达乐观，执着于事业的高尚品质。王国松先生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前辈。

谨以此文表达我们对王国松先生的无限敬意和缅怀之情。

致谢

本文撰写过程中，得到了“王国松教育基金会”和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大力支持，在此谨致谢意。



此图为王国松先生的同窗挚友，著名书画家、敦煌学家常书鸿（1904—1994）于1985年以王国松先生的名字为题，运笔而作的劲松图